

人物简介

朱镛,昭阳区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山花》《广州文艺》等刊物。出版有散文集、中短篇小说集、长篇小说。曾获首届滇东文学奖、第二届《百家》文学奖、第十二届滇池文学奖、第九届云南文学艺术奖等奖项。

朱镛:

在“快社会”中享受慢阅读

记者 文泽梅

记者:朱老师,从您的作品来看,您的写作带着很多的泥土味和青草的芳香,这些是源于生活经验还是阅读积累?

朱镛:一个人的故乡肯定对写作有影响。我出生于农村,原本的生活状态就更接近于“泥土”。一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是重要的,但阅读更重要,当两者一结合,写作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阅读可以吸收语言的精华,可以了解世界,那个世界可能是人的生活、命运、生命密码,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场域。不管怎么说,阅读会提高我们的认知和审美。

记者:影响您比较深刻的书可否列举一二,这些作品对您有什么样的启示?

朱镛:有很多,比如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《大淖记事》、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等。这些作品不仅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,还展现了另一种生命形式,探讨了人的尊严和力量。它们让我审视自己的无知,看见自己的浅薄,也让我在写作中不断思考应该放弃什么、坚持什么。

记者:您最近在阅读哪些书籍?对您来说,这些书为您提供了怎样的写作情绪价值?

朱镛:我最近读了英国作家萨曼莎·哈维的《轨道》,非常惊讶。我感到自卑又兴奋,它不仅拓宽了小说的边界,更让我意识到写作是那么有意义。它的视角、叙事、结构,以及对人类的重新审视、思考,都在警醒着一个写作者要保持意识,小说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。我会思考人生活在不同空间的处境,虽然这种思考可能是徒劳无功的,但写作有时需要徒劳无功。

记者:对于未来的创作之路,您有什么新的构想?

朱镛:目前没有,我是那种不提前准备答案的人。我觉得有时候写作是一种对世界的疑惑,对某种事物的不解,促使你去思考。我会专注于一个系列的摸索,在我现在写的小说中,总会有老年人的身影。我凭感觉来写,这种感觉在内心深处驱使着我,不断涌动、生长,仿佛赶不走。这或许是一个没有文学抱负的人的写作状态吧,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

记者:在乡愁这个词的背后,您认为我们的阅读



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?

朱镛:提到乡愁这个词,倒让我突然有一种漂泊感。我原本是尽量让自己觉得没有乡愁,因为我一直在故乡。实际上,所谓乡愁,就是在流动的现代生活中,安放我们的内心和灵魂,用爱来化解生活的疼。阅读无疑能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,找到心灵之所,故乡或许就存在于纸上的那片旷野中。这仅是我个人的感受,我觉得人还是返璞归真比较好。我的奢求很小、很简单,有时只要眼前浮现出故乡的画面,我就满足了。

记者:阅读者与写作者的身份互换后,您最想告诉读者、网友的是什么?

朱镛:如果我仅仅是一个阅读者,博览群书肯定好,但在有限的时间里,我觉得精读比博览更有意义。我甚至允许自己在某一页上停留半天。如果喜欢一本书,我可以一直读下去,读几遍,读几年,甚至读一生。我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人,阅读也是如此。在阅读中,我希望读到那种对时间和空间、过去和现在、生命和死亡有深入思考的作品,至于未来,它是神秘的,谁也无法决定和探究。

沉沉:

读书,让我的心灵始终柔软

记者 毛利涛

记者:从马鹿沟那个小山村走出来后,您的诗歌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,这是您最初的诗歌体验,还是出于某种怀念?这些字词句的背后,隐藏着什么?

沉沉:我是一个在农村出生、长大的人。也许是受早期阅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或者骨子里就刻有农民、乡村、土地的烙印,我的多数作品都围绕故土和故人展开叙述。一个作家童年时代和少年时期的生活,决定了这个作家一辈子的写作方向和价值取向,此言诚不虛。

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,见证了这个伟大时代的飞速发展。在滚滚向前的社会洪流中,当我们满怀疲惫地回望故乡时,它已变得面目全非,而我们也成了它眼中的陌生人。村口的晒场不见了,建满了大平房;祖母的老屋以及屋后的那棵大核桃树消失了,需要到一张沾满灰尘的老照片里去找;村前那片水汪汪的稻田,那条可以摸鱼捞虾的小河也干涸了……作为一个写作者,把这些已经流逝的或正在流逝的事物通过文字记录下来,既是怀念,更是哀挽。至于这些字词的后面隐藏着什么?那就见仁见智了,我一直为之努力的是:保持一颗赤子之心!

记者:从您的经历来看,是土地带给您灵感,如果从您的诗歌中选取一首,您觉得哪一首更贴近大地?

沉沉:我理解的“经历”,除了我们走过的人生道路,应该还包括通过广泛而深刻的阅读所实现的那种“身不能至、心已远游”的体验。每一位作家、诗人灵感的获得,肯定与其“经历”密切相关。若要从我诗歌作品中选出一首贴近大地的,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。我对组诗《马鹿沟笔记》中的《保明万》《出生地》《雪里的村落》等较为满意。

记者:您的阅读范围已经超越了诗歌文本,从现实主义到拉美文学,都能从您的字里行间找到些许痕迹,这些阅读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

沉沉:我的阅读确实比较杂乱,也变得越来越挑剔。值得读的书实在太多,根本读不过来,只好选择一些自认为读过一遍还能再读一两遍的书来读。所幸我的朋友圈里有几位学养深厚、涉猎广泛且眼光值得信赖的“书痴”,我把他们当作我的阅读导师。阅读优秀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,它使我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,让我的心灵始终柔软。



人物简介

沉沉,鲁甸县人,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诗歌、散文。有作品入选《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诗歌卷》等十余种选本,2016年与人合著出版《群峰之上是夏天——云南青年诗人五人集》。曾获边疆文学奖、滇东文学奖等奖项。

从背篋到云端,云南人这样阅读

在云南这片充满诗意与远方的土地上,阅读方式的变迁正悄然发生,从最初的人背肩扛到如今的数字化浪潮,云南人用独特的探索,编织出一张全民阅读的便捷网络,让书香弥漫于千家万户。

从“背篋图书馆”到“流动图书车”
在乌蒙山腹地的大关县,曾有一道独特的风景



志愿者们背着图书、文具等,行走在山间小道上。

线——基层文化工作者背着背篋,翻山越岭,将书籍和文具送到不通公路的村庄,这就是大关县独创的“背篋图书馆”。

2016年,大关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背着背篋,踏上了一条特殊的“文化扶贫”之路。他们穿越崇山峻岭,将图书送到大山深处,让更多的山里娃爱上了读书,萌发了走出大山的梦想。如今,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,“背篋图书馆”已升级为“流动图书车”,但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,依然在乌蒙山中回荡。

如今的大关县,通过整合88个农家书屋、10个图书总分馆、9个乡村少年宫,以及众多村民小组活动场所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农民书画室等基层文化活动阵地,构建起了一个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,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文化活动,让阅读成为连接城乡、沟通心灵的桥梁。

从单一阅读选择到多元阅读体验

从“背篋图书馆”到“流动图书车”,再到一个个智慧书房、数字阅读平台,云南人的阅读场景不断拓展,阅读方式日益便捷。而科技赋能与文化融合的深度交织,更为云南的阅读推广带来了无限可能。各地积极创新,满足着不同地区、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。

在昆明市,昆明市图书馆与祥鹏航空合作,在飞机上建立“云端”分馆,让旅客在万米高空也能享受

阅读的乐趣,让“诗”和“远方”完美融合。而在昆明的社区、公园、商业中心等地,一座座“城市书房”



大关县“背篋图书馆”走进天星镇绿南村。

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让阅读轻轻松松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名片。

在大理白族自治州,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实施了数字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,提供电子书籍和期刊,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端、电脑端等多种设备享受数字阅读服务,让知识触手可及。在不远处的玉溪市,玉溪市图书馆推动数字化文化传播与服务,提供有声读书服务,涵盖中外名著、亲子教育等多个专题。市民只需扫描二维码,即可随时随地听书,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。



游客通过玉溪有声图书馆,享受听书的乐趣。

从背篋背书的艰辛跋涉到如今“一屏万卷”的便捷畅达,从纸质书籍的墨香延续到数字阅读的多元拓展,云南凭借文化创新的力量,成功破解了地理环境的限制,让知识跨越巍峨群山,浸润广袤城乡。

(图文来源于《云南日报》)



人物简介

杜福全,永善县人。主要研习小说,兼习散文、评论,作品散见于《滇池》《边疆文学》《延安文学》《莲蓬》及《云南日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等报刊,出版小说集《金色的耳环》《城堡》等4部。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杜福全:

写作者要持守,不需要标榜和宣示

记者 唐龙泉飞

记者:如果拂去岁月的尘埃,您的书房一定是整洁的,您还记得自己出发时的模样吗?

杜福全:我觉得,读书人的书房是不太可能一直保持整洁的,但读书能够拂去岁月的灰尘,让一个人的内心保持整洁。离开苏田小学20年了,我在那里教了四五年书,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,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一种长久的鞭策。

记者:作为一名写作者,您的阅读面和阅读量如何?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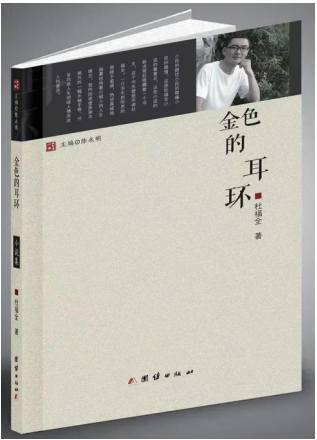
杜福全:我是一个靠阅读来支撑写作的人,阅读能让我变得安静,还能改善我的睡眠质量。我的阅读是繁杂的,通常会集中一段时间去读某个领域或某位作家的书。多年前,我曾花两三年时间集中阅读中国史,去年我又集中读了《英国史》《法国史》《美国史》。每年我大概会通读五六十本书,但阅读的速度永远跟不上买书的速度,有些书在床头和书房之间辗转多次也没能读完。我曾沉迷于叔本华、罗素、赫尔岑、刘维·斯特劳斯……也曾迷恋过米兰·昆德拉、加缪、保罗·奥斯特、加里·斯奈德、斯维拉克……

记者:这些作家、诗人和您现在的阅读、写作状况有什么关联?

杜福全:阅读与写作之间是一种传承和回应的关系。我从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书籍中学习如何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,从小说和人类学书籍中体悟人性探索的多种维度。阅读他们的作品,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和认知,还给了我写作上的诸多启发。因为阅读,我不得不思考自己写作的意义,这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气馁的事情。

记者:当下,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提出了新的思考,面对“每个人都是段子手”之类的话题,您怎么看待?

杜福全:所谓的多元化,其实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接受信息的多样化,比如手机上短视频、短剧、段子、网络文学以及人工智能等。需要注意的是,不是所有新鲜的、流行的、大众化的东西都是积极的、健康的、文明的。社会在发展进步,写作者不但要与与时俱进,而且要走得更远,但没必要刻意去迎合潮流,该持守



的还是得持守。

记者:文化为大众服务,当群众性的语言和您提到的更深入的阅读之间存在矛盾时,您认为该如何转换?

杜福全:您说的是个输入与输出的问题。评论家谢有顺有本评论集,书名叫《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里去》,他讨论的是创作问题。如果把这句话套改成“从灵魂中来,到世俗里去”,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转换的路径。

记者:您最新的写作状态和阅读方向有什么变化?

杜福全:最近身体欠佳,阅读大部头的书籍太费心力。我最近在读《齐斋随笔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动物志》《巴黎评论》之类的闲书,也读一些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献。业余时间写中短篇小说,也写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散文。我认为,作为一个写作者,应该为挖掘、梳理和传承地方文脉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记者:请分享一段您的文字和大家共勉。

杜福全:把我的散文《橡皮书店》中的一段文字分享给大家——“它就这样镶嵌在一座城市不起眼的角落里,把文明和优雅隐身于市井之中,与俗世生活融为一体,就像有些文明和优雅,隐身于世俗的面孔之下一样,存在着,不需要标榜和宣示。”

(本版人物对话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